

戰後世界與中國叢刊

從赫爾利到馬歇爾

大印千刷出版編印

中華民國卅五年二月十日

香港初版三〇〇〇

定價 港幣八角
國幣二百五十元

• 版權有 •

編輯者 大千印刷出版社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四號

出版者 大千印刷出版社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四號

發行者 大千印刷出版社

目次

前記

專著

從馬歇爾使華談到美對華外交	張鐵生
美國與中國團結	赫生

譯文

日本投降後的中國局勢	索科洛夫斯基
美國在中國騎錯了馬	勃爾特
赫爾利大使的「貢獻」	美亞雜誌
讓美國武裝部隊回家吧	J·阿倫
美國軍官對於美對華政策的意見	布萊
赫爾利的下場	斯特魯瓦特
我的和平觀	馬歇爾

附錄

美國務卿致安德遜的信
美國務卿答復赫爾利的控訴
杜魯門總統美國對華政策聲明

前記

自從美駐華大使高思辭職，史迪威將軍離華，以及赫爾利繼高思之職以後，美國的對華外交就「騎錯了馬」。一直到赫爾利辭職，馬歇爾以杜魯門總統特使的資格來華時，美國對華的政策才算走回到故羅斯福總統的路線上。

美國對華的政策之由赫爾利到馬歇爾的轉變，實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而這個小冊子所蒐集的幾篇文章，都是和這種轉變有關的。我們現在所以要出版本書的原因，有三點可以指出：

(一) 說明上述的轉變的內幕；

(二) 指出中美人民對美國所提出的要求還沒有完全實行，如駐華美軍的沒有撤退就是一個例子；

(三) 赫爾利的立場我們已經知道了，但馬歇爾的立場我們却也有知道的必要，關於這一點，他的演詞「我的和平觀」是可以供我們參考的。

因此，本書除能使我們把一段重要的中美外交史重新溫習一下而外，還能使我們明白對于中美外交所應努力的方向。

編者

從馬歇爾使華談到美對華外交

張鐵生

一

繼高思之後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終於辭職了。

赫爾利的辭職雖帶有一點突然性，但這却是早在我們的意料之中的。因此，我們認為帶有突然性的，倒不是辭職的赫爾利，而是使華的馬歇爾，而是代替兩星少將的五星上將。當美國大總統杜魯門把一個陸軍參謀總長搬到外交舞台上領大使銜而充當他的特使時，有人甚至疑心他不是在外交上也要放一個原子彈。

不過美國原子彈既嚇不倒蘇聯，也嚇不倒我們，現在我們所要關心的倒不是什麼原子彈問題（外交上的原子彈軍事上的原子彈），而是馬歇爾使華後的美國對華外交。

以下我們先來談一談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罷。

二

談到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我們又先要知道美國的外交政策究竟是什麼。在這裏，美國時代週刊曾替我們畫出了一個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輪廓，即：（一）美國除其防衛所需的基地外，在其疆界以外並沒有領土的目的，但美國希望獲得自由貿易之權，並且希望各國都有代議制的民主政府；（二）美國對蘇聯並未也不願發生爭執，但將要求蘇聯遵守一切國際協定；（三）美國將盡其所能協助戰時盟友恢復其經濟；（四）美國和蘇，英繼續合作，以懲處德日，迄其再行作戰的危險剷除為止；（五）美國已一如蘇聯，決心參與解決所有國際問題

。簡單一句話，這就是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長范宣德所說的：「照我的想法，我們外交政策的目的十分單純的：第一，保證美國的安全和維持國際的和平；第二，創造各國間商業文化交流的互惠條件，以便增進國際的幸福和瞭解。」

很明顯的，美國爲着保證牠的安全以及創造各國間商業文化交流的互惠條件，便不能不維持國際的和平，而爲着維持國際的和平，又不能不和蘇，英合作並希望各國都有代議制的民主政府。合作，民主及和平，這就說明了美國外交政策的目的。

爲着合作，爲着民主又爲着和平，美國的一般外交政策是這樣，美國的遠東政策是這樣。美國的對華外交也應該是這樣。所以，當范宣德提起美國外交政策的兩個目的以後，跟着他便把頭轉向着東方說，「我們對我們盟邦中國的政策是明白而堅定的。我們的政策過去是，將來還是要鼓勵並幫助中國發展成爲一個統一，強大，合作的國家。中國政府應依據民主原則建立，並能獲得人民的支持。」他的話是可以相信的。不是嗎？紐約先鋒論壇報也會毫不含糊的指出「美國的基本外交政策之一，乃在促成中國團結，強盛及民主化的發展。」

如果美國是澈底的實行牠的這種外交政策，那麼，沒有疑問的，這不但有利於牠，而且還有利於中國，因爲目前的中國正需要走上團結，強盛及民主化的道路，中國的內部也需要合作，民主及和平。你倘若到過中國，只要你在人民中間隨便問了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他們都衷心的反對一黨專政，反對分裂，反對內戰，都衷心的願爲合作，民主及和平而努力，並且每一個人自己又都是一個合作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平主義者。

自然，不管是合作也好，和平也好，民主却是一個主要的關鍵，這就是說，沒有一個民主的中國，便不會有一個合作或團結的中國，更不會有一個和平乃至強盛的中國。

但是，談到了這裏，問題却發生了：然則美國究竟是不是澈底的實行他的外交政策呢？

在今年六月裏，美亞雜誌就曾給了我們一個明白的答案，牠說：「美英在國際間反對一個真正的民主的政府在日本出現，同時也反對一個民主中國的發展。」

三

美亞雜誌的話並不難找到證明，而其證明就在剛辭了職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身上。當高斯辭職，史迪威離華，赫爾利出任大使的時候，美國人民的眼光在看着他，中國人民的眼光也在看着他。當赫爾利僕僕風塵，奔走於重慶和延安之間的時候，美國人民的眼光在看着他，中國人民的眼光也在看着他。

爲什麼？因爲在赫爾利的兩肩上正挑着一個促成中國民主，統一及強盛的重担子。

然而，可惜的是，一個不明白中國國情，而又使一切明白中國國情的屬員離職的赫爾利，却「在中國騎錯了馬」了。「騎錯了馬」的結果便不免如紐約先鋒論壇報所說：「美國目前在中國的行動，完全超出了美國永久政策的範圍。這個一般認爲健全的政策，是去鼓勵團結和民主的中國的發展。而今天美國的行動却似乎是去維持由內爭所造成的貧弱而不民主的中國的存在。」

而其講得更露骨的就是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孟氏菲爾德，他曾大聲疾呼的喊道：「亞洲大陸今天是一盆沸湯，而影響這個大陸的問題，對我們和對世界都有鉅大的重要性。據我的意見，我們必須趁早從中國大陸上把我們的海陸空軍撤退，因爲我們停留在中國越久，就越有可能被捲入中國內部的情勢裏面去。我希望我們應趁早從中國脫身。對日本的戰爭已經結束了，而我們却還在加強駐華的美軍，並運送更多的軍隊到中國去。第一和第六海軍陸戰師的登陸華北以及美國巡洋艦的駛進煙台，造成了對中國內政的不公道的干涉，而這些

行動無疑的是根據中國當局的請求的，因此，我覺得我們在繼續進行這一『砲艦政策』上止在造成一種嚴重的錯誤。真的，在那裏並沒有美國的商業，也沒有美國僑民住在那裏需要我們保護，如果這個政策繼續執行的話，那麼，我們在那個區域的士兵的生命就會被捲入到危險裏面去了。

因此，儘管赫爾利在辭職後發了一大套牢騷，說『美國標榜一種外交政策，執行者則爲另一種外交政策』，而想把責任推到國務院某某外交人員的身上，可是推開窗子說亮話，美國國會議員民主黨戴賴西以爲他『在華的措施却特別促成了內戰的形勢』，所以他所說的『執行者』其實就是他自己，他所說的『另一種外交政策』其實也就是他自己執行的。他那興風作浪的一大套牢騷，結果只引起了幾個頑固的孤立派的興趣而已（見路透社二十八日電）。

正由於赫爾利要負『執行』『另一種外交政策』的責任，所以民族週刊便接着孟氏菲爾德的話說：美國應該馬上採取兩個步驟，首要的步驟是立即撤退美軍，等二步驟是用自由傾向的人士代替赫爾利，藉以恢復史迪威和高思的政策。

現在，赫爾利終於辭職了，民族週刊的主張終於勝利了。

四

不過，我們認爲美亞雜誌的話能在赫爾利的身上找到了證明，這自然不是單單指的他一個人而言，因爲他不過是一個『執行者』，而站在他背後以『另一種外交政策』指使他『執行』的却大有人在。

提起了『另一種外交政策』，我們便不能談到最近紐約時報所指出的美國外交政策了。

。如紐約時報所說：今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所注意的有三點，即：第一，不容許任何侵略國（如日本）有威脅美國的形勢；第二，遠東民主政治的實現，須由人民自動接受，而不應由一個強大的政黨下令強迫；第三，在遠東黨派紛擾，經濟紊亂的情形裏，建立穩定局面，以作爲實行民主政治的初步。

在這裏，顯然的，第一點是和第二點，第三點有關的。上面所引的美亞雜誌也會說過：「日本的領袖們無疑的明瞭到不能取勝；但現在有種種迹象，說明他們仍然希望保存政治和經濟機構的完整（這種機構正是他們的實力的基礎），以避免軍事上的完全失敗。這個希望根據於以下的幾種假想上：首先是由美國人渴望結束遠東戰爭，將不致於贊成長期管制戰敗的日本；其次，在太平洋的戰後政策上，主要強國間的團結將要減弱；第三，日本將盡其反對『布爾塞維克』的威脅的堡壘的任務；第四，中國將仍然是積弱和不團結的國家。假使這幾種假想裏有一種證明是對的，日本就可能保存其作爲侵畧的溫床的社會機構，而遠東的情況也就可能便利於日寇侵略野心的復活。」因此，美亞雜誌除警告美英要打破日本領袖們第一個，第二個及第三個希望而外，還說過一句語重心長的話：「任何西方的列強對於一個民主，團結和經濟發展的中國，無需存着恐懼，只有這樣的一個中國，才能使得日本統治者保全他們的侵略基礎的計劃不致於成功。」這却是特別值得美國深深注意的。因爲美國今後如果決心不容許日本有再威脅牠的形勢，那牠就不能不努力促成「一個民主，團結和經濟發展的中國」，就不能不努力促成遠東民主政治的實現。

然則美國怎樣才能促成遠東民主政治的實現呢？

要促成遠東民主政治的實現，美國就先要對民主政治有一種正確的看法。所謂真正的民主政治，一定會爲人民所自動接受，因爲這正是他們所要求的。如果有一種民主政治而須以

人民自動接受爲前提，那麼，這便是假民主，而不是真民主。假民主就是由一個強大的政黨下令，也是不能以一手掩蓋天下人的耳目的。因此，美國所應顧慮的，乃在民主的真不真，而不在人民的接受不接受。

復次，美國倘若以爲在遠東要先建立穩定的局面，才能實行民主政治，這却又是一種不正確的看法。要曉得：建立穩定的局面並不是實行民主政治的前提，而實行民主政治倒是建立穩定的局面的前提。就由於政治不民主，黨派才發生紛擾，經濟才趨於紊亂。反過來說，政治一民主化，黨派就不會再紛擾，經濟就不會再紊亂，而局面也就會穩定了。

簡單一句話，美國倘若有促成遠東民主政治的決心，有澈底實行牠的基本外交政策的決心，那麼，今後牠就不應「反對一個民主中國的發展」，不應故作癡聾或以耳代目的以人民自動接受或建立穩定的局面爲前提來拖延中國實行民主政治的時間，否則不管什麼人來代替赫爾利，他都要以在中國「執行」另一種外交政策」的原故而像赫爾利一樣的「騎錯了馬」。

五

話又說回來了。據美聯社的二十八日電所說：「美國的對華政策，在赫爾利辭職前，已因美軍有捲入中國內戰漩渦的危險，而經過了嚴格的檢討」。那麼，馬歇爾使華後的美國對華外交究竟怎樣，自然是值得我們關心的一件事了。

五星上將的馬歇爾，不用我們介紹，可算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卓越人物。可是他特別叫我們注意的地方，倒不在於他那眩目的徽章，而在於他到過中國，研究過遠東問題，在於他會澈底爲着反軸心，反侵略而努力，並且還關心過中國的反侵略戰爭。因此，當他出任駐華特

使的時候，雖然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繼續赫爾利和魏德邁所走的路，一條是轉向史迪威和高思所走的路，一條是要變本加厲的路，一條是要改弦更張的路，但他既不會徬徨在歧途上，也不會停頓在中途上而不進，如果他真明白中國的國情而又未曾忘掉過去反軸心，反侵略的努力，那他就只有選擇史迪威和高思的路，選擇一條改弦更張的路，這便是民族週刊所說的，恢復史迪威和高思的政策。惟有這樣，馬歇爾才不致違背他過去的光榮歷史，也不致辜負美國人民及中國人民的熱烈希望。

自然，我們也不是單單談的馬歇爾一個人，而且還要涉及白宮一方面。在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不但馬歇爾的使華有立刻解決國共糾紛的企圖，就是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也有和睦解決華北國共兩軍衝突的希望，並且他在赫爾利辭職，馬歇爾繼任以後，還表示美國政府實樂於用得當的人員來調和中國的兩大政黨。這是我們所歡迎的。

不用說，要調和中國的兩大政黨，非先解決國共糾紛不可，要解決國共糾紛，又非先解決國共兩軍衝突（不單單是華北一方面的衝突，而且是全面的衝突）不可。這就是說，要儘速停止中國的內戰。泰晤士報說，政治解決的成功，只需要交涉而不需要武力。牠的話是對的。

而爲着使得中國的內戰能儘速停止，在華的美軍是需要撤退的。否則他們就不能避免干涉中國內政（這就是孟氏菲爾德所謂不公道的干涉），而內戰也就有延長的可能了。因此，儘速撤退在華的美軍，儘速使得中國停止內戰，這便是馬歇爾到華所應進行的最重要的任務。這樣，不但可以解決國共糾紛，調和中國的兩大政黨，甚至還可以因此而促成「一個民主，團結和經濟發展的中國」。

要注意：「只有這樣的一個中國，才能使得日本統治者保存他們的侵略基礎的計劃不致

於成功。」

還要注意：「只有這樣的一個中國」，才能如范宣德所說而「構成了我們和蘇聯在遠東關係上的緩衝器或橋樑」。

十一月三十日。

美國與中國團結

赫生

從已經宣佈的美國對華政策的文件中，我們看到美國是需要中國團結的。

杜魯門總統於十二月十五日的聲明中這樣說：『美國政府堅信一個強大、團結而民主的中國對於聯合國組織的成功與對於世界和平都是極端重要的。一個解體的與分裂的中國，無論那是由於像日本所進行那樣的外國侵略或由於中國激烈的內爭，對於目前與將來的世界安定與和平，都是一種破壞的勢力。』

貝爾納斯國務卿在答覆衆議員安德遜的信中也說：美國對華政策的遠大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團結民主的中國。』

這個政策雖然是在美國檢討赫爾利的路線與赫氏辭職後宣佈，但過去已發表的材料與事實都顯示着這就是羅斯福總統的對華政策。羅斯福給予高思與赫爾利來華的使命是：加強中國的抗戰力量，使中國免於崩潰；促成國共兩黨的團結，特別是在軍事努力上的團結。赫爾利和魏德邁在執行羅斯福的政策時曾企圖歪曲與破壞它，結果造成了中國目前的緊張局勢與中國人民對於美國政策的懷疑和反感。但赫爾利的路線正在被清算中，美國政府的聲明已爲美國政策肅清了許多疑雲。

至於美國的輿論，更是主張中國強大、團結與民主的。除開反動的斯克利浦斯豪華德系的報紙和魯斯的三大雜誌之外（中央社是最喜歡轉發這些報刊的言論而抹煞其他真正代表美國民意的出版物），差不多所有報紙雜誌都一致抨擊赫爾利和魏德邁干預與製造中國內戰的政策，而且也正因美國人民的攻擊，赫爾利才不得不辭職的。

我們相信美國是需要中國團結的，那不是單純相信美國官方的文告而是從觀察客觀形勢所得到的結論。

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美國戰後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問題：如何為生產力已大為提高的工業尋求市場與原料，如何為復員的士兵尋求幾百萬個職業。這是爛熟期的資本主義的老問題，這次世界大戰不獨沒有把它解決，而且使它更加嚴重了。面對着這問題的美國在目前不能以德日意等法西斯國家所採取的方法（發動重分殖民地的戰爭）解決它，因為那會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帶入死亡之途。她所能實行的只有以和平的方法盡可能獲得更多的市場，並且把既得的市場擴大——提高其購買力，使其與美國的生產成比例的增長。

戰後的中國差不多被美國看做獨佔的市場了，除了英國的可能的競爭之外，已沒有任何其他國家能與美國競爭。如何鞏固與擴大這個市場，當是美國當前最注意的事。

由於美國不能像英國控制印度那樣控制中國，也由於美國資本主義尤大與英國或其他資本主義國不同，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政策將是比較開明而進步的。這政策將是發展中國的農業和工業（主要是輕工業），發展中國的交通，開發中國的礦產。這些設施一方面可以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即增強中國人民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可以供給美國以其所需的原料，並以交通的便利使美國貨物暢行於中國。

美國是不懼怕也不忌妒中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的提高的；美國所懼怕的毋甯是工業技術已發展而人民生活水準仍低下的中國。日本是一個教訓。日本憑其進步的工業技術與廉價的勞動力，生產出廉價的商品投到國際市場去，曾驅逐了不少的美國和英國的商品。假如中國變成日本，她所生產的廉價商品對於美國將是一個巨大的威脅。所以美國需要中國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高得像美國人民的一樣。

只要中國不能生產比美國更廉價的商品，只要中國在美國所特長的重工業部門上不能和美國競爭，美國是不怕盡力幫助中國發展其工業而成爲現代化的國家的。現代化的中國和美國的貿易將十倍乃至於數十倍於貧乏而落後的中國和美國的貿易。工業化的日本和美國貿易大於落後而人口多數倍的中國和美國的貿易，這事實就使美國資本家覺得促進中國現代化的必要。四萬五千萬的中國人的購買力提高之後，對於一萬六千萬的美國人將有如何大的幫助。

要發展中國的產業而促進其現代化，最重要的條件是中國能團結而民主。內戰頻仍而政治腐敗的中國是不能進行建設亦不能購銷多少美國貨物的。華萊士副總統來華之後，曾強調中國內部團結的必要。拉鐵摩爾基於同樣的理由而主張協助中國民主團結。新共和雜誌於國內戰危機急迫時也憂慮這內戰會『摧毀美國獲得廣大的市場的機會。』（見Andrew Roth文，載八月二十七日新共和雜誌）。

美國對華實行較開明的政策不僅基於經濟的要求，而且由於政治的必要。

首先是美國需要一個安定的戰後世界。美國目前不需要戰爭，也不願世界各地發生着革命性的戰爭。地方性的戰爭的延長與發展將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與資本主義潰亡的導因。美國之喋喋不休地在談論原子彈，在某方面說正是表現美國懼怕戰爭的心理。除一部份美國的死硬派如魯斯赫爾利之流外，美國的統治者與支配階層是不希望繼續發生戰爭的。

眼光遠大的美國人需要蘇聯在戰後繼續合作。美國幾個月來雖然處處在設法限制蘇聯的發展與打擊蘇聯的威勢，但基本上還是不願在目前和蘇聯破裂的。如果中國的內戰危害到美國和蘇聯的關係，美國所損失的將不能在中國所或能取得的利益補償。在美國不願進行反蘇戰爭的時候，中國中央政府是不能正式地進行反共的戰爭的。這又形成了中國團結的必然性

美國以領導的姿態出現於戰後的世界，她主觀上是要駕乎另一個領導國蘇聯之上而為全世界至高無上的國家。因此她處處和蘇聯競爭。蘇聯雖然並沒有和美國爭領導權，而對中國問題，蘇聯甚至在很久以前就表示過讓美國單獨來處理，但是蘇聯的政治作風客觀上造成了遠東各民族對她的信仰。蘇聯這種成就美國是不能以武力奪取的，中國近兩三個月的事實就證明武力不獨不能增進美國的威信，而且減損了它。美國要和蘇聯競爭只有在政治作風上和她競爭。

蘇聯尊重中國的主權，如約的把紅軍克復的東北交還中國，不干預中國內部問題，不援助中國共產黨，不和美國競爭來掌握中國，更在盟約上說明並以事實證明願意支持獨立強大團結而民主的中國。這是如何光明磊落的態度。這種外交政策必然造成中國人民對蘇聯的好感，其影響所及，將不祇增進蘇聯在落後弱小民族間的信譽，而且提高蘇聯在全世界的地位。在蘇聯這種政策之前，美國應該拿出怎樣漂亮的政策來和它比量呢？

這又規定了美國必須對中國實行最大限度的開明政策，那就是：建立一個強大團結民主的中國。

美國雖然給客觀條件決定着實行開明進步的對華政策，但在執行的過程中常常因受到反動力量的阻礙而離開正軌。在資本主義末期的美國，社會階層的分化與極端性是特別顯著的。有同情中國強大民主團結的人，也有企圖把中國實際上變為殖民地的人；有主張與蘇聯合作的人，也有鼓吹反蘇戰爭的人。後一種人以種種偽裝的姿態出現。他們常常以攻擊別人為孤立派為法西斯份子來掩飾自己正是孤立派與法西斯份子。羅斯福總統逝世之後，他們的反聯和反民主的活動更來得積極，在國會，在政府各部門中，並且在他們所謂輿論上陰謀牽

制與劫持杜魯門總統。赫爾利在中國的反動政策就是這派人活動之一端。

當史迪威與高思在中國內部團結問題上和中國當局相齟齬而離職的時候，繼任的赫爾利和魏德邁的任務是設法促成國共兩黨的團結以加強中國抗戰的力量。爲着作戰，美國急迫地需要中國團結。羅斯福總統二月間在雅爾達會議裏，曾主張武裝中國敵後的一切抗戰部隊。赫爾利於去年十一月初攜帶了羅斯福關於國共兩黨團結作戰的方案到延安去，並和中共在這方案上簽了字，這些都證明美國總統所賦予赫爾利的任務是促進中國團結而不是助長中國內戰。

然而赫爾利有他自己的政策。他沒有尊重蘇聯保證不過問中國內政而讓美國來單獨領導的善意，妄以爲在蘇聯袖手旁觀而日本已經投降的情形下，美國可以用優勢的物資協助中國中央政府以武力統一中國，從此可以確立與鞏固美國在中國的獨佔地位。赫爾利這種用意隨着美國在太平洋的逐步勝利與日軍的逐步失敗而漸明顯。

二月間美軍在琉球島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同月間魏德邁就在重慶聲稱不能裝備國軍以外的任何中國部隊。三月間美軍登陸硫磺島，四月間赫爾利便說武裝中國共產黨就等於承認中共是一個交戰團體。八月間日本宣佈投降，從那時候起，赫爾利和魏德邁便以積極的軍事援助掀起了中國的內戰。在對日戰爭的末期，他們以爲美軍已能不惜重中國的兵力便可以擊敗日本；中國在軍事上的團結對於美國已可有可無。在日本投降後，中國在軍事上的團結對於美國已毫無意義，而美國對於戰後中國的控制，在他們看來却成爲最重要的了。

赫爾利和魏德邁執行這種政策所引起兩三個月來的中國內戰與美蘇在中國的不愉快關係，招致了美國人民與國會對赫爾利的攻擊，並促成赫爾利的辭職與美國政府及國會重新檢討對華政策。

馬歇爾的使華在美國外交史上是一件不平凡的事，這不獨是因為馬歇爾在美國聲譽與地位之高。尤因為這件事是表示美國對華政策以至於對蘇政策的刷新。

倫敦外長會議的失敗與中國不宜的內戰之發生，是過去半年中美蘇關係惡化的最高峯。美國在反動派策動下的反蘇活動並沒有給美國贏得多少好處：既不能以原子彈威嚇蘇聯俯首就範，也不能成功地在蘇聯邊境佈置下反蘇前哨，尤不能減損蘇聯在國際間的威信，相反地，這種活動只造成了國際間黯淡而危急的情勢，使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相信美國是在步德日意嗜戰的後塵，因而大減削了美國的威信。碰壁後的美國外交必須另覓可行的路線。最近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順利進行與赫爾利對華政策之被清算已使陰暗的國際局面漸漸開朗了。

杜魯門和貝爾納斯在馬歇爾受命來華時所宣佈的對華政策是揚棄了赫爾利的路線後的美國對華政策的新階段。

杜魯門十二月十五日聲明於闡明美國政策的目標之後，接着就說『中國人民不能放棄任何以和平談判立即解決爭端的機會』同時更具體地說出解決的建議：『美國認為中國目前的國民政府是一黨政府，且相信如果這個政府的基本加以擴大而容納中國的其他政治黨派，則中國的和平，團結與民主的改革必能增進。因此美國堅強地主張：中國應召開各大政黨代表會議，協商出能使各黨公正而有效地參加中國中央政府的方案。美國認為這需要改變中華民國國父孫逸仙先生所建立以作中國向民主邁進的進程中的臨時方案的一黨專政。』

貝爾納斯於十二月七日的聲明中也說出同樣的意見，強調『蔣介石主席的政府必須擴大，以容納目前在蔣主席政府中無發言權而組織良好之其他各大集團的代表。』

馬歇爾到中國後對這政策尙未直接有所申述，但他說杜魯門總統和貝爾納斯國務卿已說

得很清楚了。他還沒有提出處理中國問題的具體方案，但他不能繼續走赫爾利的路線則是可確定的事；而從已公佈的新聞，也可以看到杜魯門所提出的『國民政府軍隊和共產黨及其他部隊之間商議停止戰鬥行動』的主張已由馬歇爾強有力地轉達給中國爭執的兩方。

中共於二十二日曾非正式提出無條件停止戰爭的建議，中央政府表示『如非用書面提出，決不予以考慮。』中共方面於是表示準備以書面提出。這是在馬歇爾鼓勵下國共兩黨談判的第一步。這一步是否能圓滿解決，現在還未能預料，但我們認為，要中國內戰停止，首先就要美國立即停止駐華美軍參加中國內戰，立即停止對作戰的任何一方的軍事協助與物資供應。解鈴還是繫鈴人，美國的干預引起了中國的內戰，因此美國的絕對中立是國共停戰的先決條件。

國共雙方第二步是否能以各黨派代表的政治協商會議解決他們的爭端，是否能擴大中央政府以容納各黨派，是否能成立聯合政府以結束一黨專政為國民大會鋪平道路，對這些問題的解決，美國所能為力的地方是和國共兩方一樣多的，因為『重慶是完全聽命於華盛頓的，在外交上，在經濟上，並且在軍事上都是如此。』（八月二十七日新共和雜誌。）

美國正在進行着經過檢討後的對華政策，我們歡迎它。但我們不能不有一些保留的態度，因為第一，美國國內的法西斯份子還沒有肅清。他們在待機影響或操縱美國的政策；第二，中國自身的某種錯誤政策也足以啓美國反動份子的野心。和平團結與民主的獲得要靠自己的努力，友邦的善意與協助的取得也靠自己的振作。表現出能夠成爲現代化國家並能有助於美國的中國，美國也必然支持她強大團結而民主的。

三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於香港

日本投降後的中國局勢

索科洛夫斯基作

大批美國武裝力量的駐在中國領土上，呈現爲不僅惹起中國和美國的，而且更惹起全世界的民主社會人士正當的憂慮的當前國際局勢中的那些要素之一。這種憂慮，并不曾因爲最近辭職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所發表這麼許多演說影響的而減輕，赫爾利率直地展開美國對中國侵入的帝國主義的程序，以便對抗『英國帝國主義』并且對抗他本人所憑空捏造的『蘇維埃帝國主義』。

爲什麼在遠東戰爭結束和日本投降以後的三個多月，現在還有許多美軍，包括步兵、空軍、坦克和海軍，竟然駐在中國呢？美軍滯留在中國，難道和尊重這個強國的主權符合嗎？難道和聯合國組織中所有各會員國都有遵守義務的關於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符合嗎？

如所週知，中國的內政問題，直到現在，依然顯得十分尖銳。爲一切聯合國所承認并且予以支持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當前有着重大的任務，要處理國家民主化的事情，并且要在這個基礎上把全國創造力量團結起來。這些任務的實際解決，要求和那些在抗日戰爭中已發起了非常偉大的作用，並且博得本國遼闊區域內廣大民衆支持的民主份子取得協議。

美軍的駐紮在中國領土上，對於作爲一個偉大強國的中國將來命運首先所繫的這個問題的積極解決，會有助力嗎？遺憾的是：事實說明了正相反。美國武裝力量駐在中國，徒然鼓勵最不能妥協的那一班中國反動份子，教唆他們所想像的實力，並且推動他們走向由於無視中國人民民主勢力的合法志願而招致的充滿危險的結局。

關於美軍滯留在中國這一件事，必須加以解釋的時機似乎已成熟了，於是美總統杜魯門

就發表美國對華政策的聲明。在這篇聲明中，從兩方面來解釋美國武裝力量駐在中國的理山：據說美國「已經協助而且還繼續協助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使解放區中的日軍解除武裝和撤退得以實現。美國海軍陸戰隊駐紮在華北，就是爲了這個目的」。這裏，關於美軍其它兵種：空軍，坦克部隊和海軍艦隊，爲「什麼樣的目的竟然也要滯留在中國，這個問題的確定還待闡明。

聲明中又從另一方面說：『除非日本在華勢力全部被掃除，除非中國成爲一個團結的，民主的與和平的國家，並且取得日本的地位而代之，否則太平洋的和平即使不被破壞，也要遭逢危機的。美國的海軍所以要暫時留在中國，就是爲了這個目的』。

不難注意到：以必須使日軍解除武裝和撤退做口實，也決不能在戰爭已經結束以後還作爲一個充分的理由把大批美國武裝力量調到華北去。

的確，難道可以這樣假定嗎？以爲在戰時曾經順利地抵擋住日軍的猛攻的中國自身的武裝力量，在日本投降以後，倒反而不能夠處理更容易到無可比擬的關於把敵軍解除武裝和撤退的任務嗎？另一方面，在第二種解釋中所提出的更加廣泛的任務，也不能不引起困惑。因爲在第二種解釋中不僅說到日本在華勢力的全部被掃除，而且更說到那種目標的達成，如像團結的、民主的與和平的中國的建立。然而，難道像這樣的任務，也要憑藉武裝軍隊的帮助才能夠解決嗎？

無論如何，有一點總是明明白白的，如果是說的根絕日本勢力的話，那麼，就不能不承認這個任務在滿洲却是最重要的，因爲那兒有過特別多的日軍。如所週知，在一九三一年的秋天，日軍就已經佔領了滿洲，並且後來更利用它作爲開始準備掠奪中華民國的其他領土的根據地，日本正是要把滿洲變成自己的殖民地，並在那兒製造自己的一個傀儡制度，號稱『

滿洲國』。還有一點也應該注意到：滿洲在很長的邊界上都和蘇聯接壤，而如所週知，華北却是處在距離美國領土十分遙遠的地方，因此，無論如何，蘇軍在這個時候或那個時候留駐在滿洲，實比任何一個外國的軍隊留在華北，具有更大得多的理由。

美國在中國騎錯了馬

勃蘭特作

魏德邁將軍應該回答一些問題。問題之一是：

美國答應在戰爭期間裝備中國九十個師，以作對日作戰之用。在日本投降的時候，已經裝備好了二十個師。如今戰爭已經結束，魏德邁決定再裝備七十個師，這話的確不的確呢？如果是真的，爲什麼？對付誰？

……武裝的日本人是我們的敵人。但曾經對美國宣戰的中國僞軍和僞政府怎樣呢？爲什麼我們竟和這些賣國漢奸合作？對於這些奸徒，重慶是似乎加以歡迎，以使用作政治資本的。我們把這些僞軍看成盟友，那就是干涉中國內政，違反我們自己的利益，並且超出一切常情之外了。我們這樣做，一定要引起人民大眾的憤怒。

赫爾利大使曾經設法使國共調協。以私人關係而言，他做得不壞，但是人們不免會覺得他把勸解的技術和欺騙的技術混而爲一。他的拒絕把軍事供應品給中共的政策，加上魏德邁將軍的在戰後時期武裝並訓練中國軍隊的政策，似乎就是想巧妙地消滅延安的整個制度——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

……不論反對共產黨或贊成共產黨，美國對於中國內政，毫無作軍事干涉的必要。

何況人們還得明瞭一點，就是中共黨人的『共產主義』，和美國明尼蘇達州和北達科他州的農夫所有的『共產主義』一樣多。他們贊成私人擁有農莊，但反對不耕而食的地主主義。他們擁護清廉的地方政府，而反對腐蝕着中國其他各地的貪污偷竊。這是他們的『共產主義』的內容。……（紐約下午報）

赫爾利大使的貢獻

前兩期美亞雜誌上關於中國政治形勢的討論，主要的是論及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無法達到某些協議的基礎。但是，要分析一九四五年頭三個月的中國局勢之發展，如果對於這一時期美國政策的變動，以及美國現感到了自食其果的困難地位沒有詳細的考慮的話，就不會有一個完整的分析。中國的形勢在一九四五年前是繼續不斷地危急，但是當時美國的影響經常使它尚有轉變的餘地，但自一九四四年末魏德邁將軍和赫爾利代替史迪威將軍和高斯大使以來，中國的危機已發展到一個完全的和危險的僵局了。在這個僵局中，美國人民也一定會遭受到痛苦。

魏德邁將軍雖然是一個能幹的軍事領袖，但缺乏史迪威將軍對中國情況的深刻的智識，而且他對於政治問題是趨向於採取極端保守的立場，而政治的保守主義應用於中國時，就很容易變成支持極端反動的份子。但是，推翻了史迪威將軍與高斯大使所倡導的有希望的政策——這一政策曾經表示了美國贊成以民主方法解決中國國內的分歧——的主要責任，必須由赫爾利大使負之。

赫爾利大使到了中國來，他過去調整互相衝突的利益爭執與糾紛是富有經驗的，但他顯然沒有具備解決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所必備的知識，這些是基本的問題：民主對獨裁，封建制度對現代經濟進步。在這些基本問題上，是不可能妥協的。不能有這樣的東西：如像折衷的民主，或部份的人民的自由，或基於古代的和壓迫農民的土地制度之上的強制式的現代化的經濟；但赫爾利大使不能認識這個事實，結果他就以為中國共產黨之拒絕與重慶『妥協』是

不合理的了。例如，他不能理解共產黨爲什麼不願意把他們的軍隊交給國民黨指揮，他仍認爲蔣介石之辯稱『沒有一個政府能够容忍有一個獨立軍隊之存在』是合情理的了，於是他十分容易的屈服於蔣介石的主張，說亞洲的主要危險是『赤色危險』，說對共產黨作任何讓步是無用和危險的，說美國的軍事和經濟的援助應該嚴格只限於給重慶政府。

赫爾利採取這種立場，顯然是得到魏德邁充分的支持，魏氏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宣稱：他沒有得到權力給共產黨戰士以援助。并稱：已訓令在華的一切美國軍官，不要幫助那些不屬於重慶政府的個人或團體。赫爾利大使在上月返美國討論對華政策之後，對於這一政策解釋得更清楚。例如他在四月二日與新聞記者的談話中，強調這一事實，即美國在華政策是致力幫助中國軍隊的統一，而這一個總的目標，就使得不能扶植或幫助武裝的中國共產黨的發展，除非他們變成國民政府的軍隊底一部份。他辯稱：美國以武器裝備共產黨，是等於承認在中國有另一個政府；他并且說，如有武裝的政黨和軍閥，力足以抗禦中央政府的一天，中國就一天不會統一，這些主張，只表示他完全忽視了大家共知的事實：即中國的『國』軍只是國民黨的軍隊，而中央政府則只是一個『武裝的政黨』，故其要求共產黨放棄其軍隊指揮權，而國民黨獨裁政府却依然存在時，就等於叫他們接受解散其作爲一個政黨。據說，赫爾利大使曾對華盛頓的一羣人這樣描寫中國共產黨軍隊：『他們是一個政治團體底會員，我來這樣說吧——好比我們共和黨員武裝起來。』在美國，一個政黨如有聽其指揮的武裝力量，當然是不能容忍的，又是不能想像的，但是中國不是美國，很可以問問赫爾利將軍如果美國軍隊是完全爲民主黨獨自指揮，而共和黨人之作爲政治力量，而繼續存在的唯一機會是在於他們擁有武裝力量，那麼，他對共和黨武裝起來將覺得如何，赫爾利大使顯然是把美國駐華大使館及美國軍事觀察家多年的觀察及研究所得的結論，完全拋棄。他接受了蔣介石的謬妄的說明，認爲

中國的問題是共產主義與國民黨思想間之問題，而不是把中國的問題看成民主對封建的問題；他堅持着只有毫無保留的支持現在的政府，才能促進中國統一，顯然忽視了國民黨之內很有力的力量，曾經繼續要求民主的統一近代經濟與制度的發展。

赫爾利大使與魏德邁將軍所採取的態度，必然使蔣介石深信美國政府已確定的對重慶政府作了約束，不會再加壓力於重慶要其對任何反對黨派讓步了。使蔣介石對於共產黨及對於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反對派採取強硬態度者，也正是這個保證，這是很少疑問的，例如蔣介石在三月一日的演講中，他明白的表示其決心，反對於十一月召集國民大會之前成立任何種聯合政府的要求。（我們在以前的『美亞雜誌』曾經指出一個要求是基本的要求，因為問題之關鍵，在於中國政治的前途是否由國民黨所指派和操縱的國民大會來決定，或者其他黨派是否在制憲大會之代表選舉和討論中都有發言權。）（美亞雜誌）

讓美國武裝部隊回家吧

J·阿倫作

美國海軍在華北海岸巡行，爲了什麼？北平天津的美軍，兩個師團在幹些什麼？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解放區中間的，以及八路軍駐守着的秦皇島登陸，又爲了什麼？

官方的理由說，登陸是爲了在這些地區接受日軍的投降。但是在那些地區，有很多的中國軍隊十分願意去解除敵軍的武裝以及管理敵軍，而且他們做起來要比我們在中國其他地方做過的好得多。真正的理由，是因爲這些軍隊是解放軍，是八路軍，他們早已把這些地區解放了，把敵人逼進了大城市。而美軍登陸的目的，在其他理由之外，是在於阻止八路軍進入城市，在於留起來讓國民黨的反動派進去。

我們的入伍公民所組成的陸海軍，並不是爲了這樣做而設立的。我們的人已經在反軸心戰爭中盡了光榮的義務。可是現在他們發現自己是在一支干涉軍裏面。……

干涉中國內政，幫助國民黨去反對民主勢力，無疑地是我們在中國本土的軍事行動的主要理由。但更有其他同樣嚴重的理由在。

我國目前在華北的軍隊和船隻，要比我們在戰前所有的多，在戰前，我們在華北只有一些海軍站和煤站。而華盛頓對於中國的東北角，正發生着濃厚的興趣，而東北和蘇聯的主要安全區，是離得最近的。

誰要推翻蘇聯在亞州東北的安全地位，就會把天津、北平、煙台等地看成是重要軍事基地。日本在從事更大的冒險之前，就會經攬取了東北以及華北地帶。

在排斥外人的佔有日本以及在太平洋上建立根據地的政策之上，美國在這個地帶的行動

，不能不使蘇聯理由充足地不相信美國的動機，因為這個地區離開美國可能設想為有關其安全的全的任務地方，都是太遠了。

干涉華北還有另一種理由，那是由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斯蒂爾從北平打來的一則消息裏間接暴露出來的。他說，他去訪問過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行長，那個日本關係再三說明保存『華北開發公司』的完整之必要，那華北開發公司是日本人在華北設立的龐大的工業康拜因。

據他說，該公司每年產煤二千四百萬噸，產鹽極多，還有大規模的煉鹽廠。該公司直接僱傭的人約五十萬人，另有各種工業中的八十萬人，間接依賴着該公司。這個日本關係請求保留日本專家，並且居然提議中國接收該公司。要知道在這重慶和華盛頓十分親密的時候，『中國』一詞，常常不免是修辭學上的美國的代名詞。

不論替國民黨反動派『收復』華北也好，建立美國反蘇前哨也好，總之，在中國，沒有我們武裝部隊的事。讓他們回家吧！（紐約工人日報）

美國軍官對華政策的意見

美國有一批軍事領袖相信美國會停止它的對蔣介石的「空頭支票」的支持，而且會在外交上，財政上，道義上壓迫國民政府使它與中共方面議和。杜魯門總統的對華外交政策的談話就是這一派軍事領袖們的顯然的勝利。美國陸軍和海軍的高級軍官們之間，對於美國在華所扮演的角色，意見不同，相互之間有着一道很深的裂痕。美國可能轉變中國全面內戰的形勢，中國內戰一開，各國都受到不良的影響。但是他們互相反對，正如美國國內的外交團反對辭職了的駐華大使赫爾利一樣，赫爾利就是最主張全力支持蔣介石的人物。有些美國的陸軍軍官公開主張支撐中央政府，用美式軍械，用金錢，其次就是用船隻或軍隊做後盾，這就是無疑問的會使重慶政府打倒它的對手；然而這樣做，自然也就不能建立一個自由民主與聯合的中國了。另一些軍官——他們團聚於魏特邁中將的週圍——已經提出了，而且已得多數人的擁護，主張把中國問題讓聯合國機構去解決。然而這就使得分散了責任，而蘇聯在華的影響也加強了；而且，——那些反對這種意見的人會這樣說——那就會把中國無論國內外的磨擦都無限地擴大及加強起來。

擁護杜魯門的政策

然而海軍及海軍陸戰隊的軍官們，他們覺得有關係，因為他們已經用船輸送了許多國民黨的軍隊，而目前還在守衛着他們的鐵道綫，因此就極力贊成杜魯門總統的意見。他們要中國作戰的雙方都停戰息事，讓步一下。大家來建立一個統一的政府，那就可以經過民主的程

序，醫好他們國家的病，當我把這問題問起他們的時候，大多數在場的美國軍人的回答是：「首先，我們幫別人去打內戰那是毫無道理的，因為那其實不關我們的事。中國共產黨自然很難打贏的，因為國民黨有成千成萬武裝的日本軍隊幫手，而且還得到美國海軍陸戰隊間接的支持。但在另一方面，假如我們繼續這樣幫蔣介石的忙，給了他許多美國的軍械，船隻，和金錢，又讓他去使用我們的軍隊，那麼他一定不肯讓步的了。他怎麼肯讓步呢？他知道他想要什麼我們就給他什麼的！」

杜魯門政策的基礎

這些軍官統統感覺得美國應該堅決的去叫共產黨及國民黨雙方和解，要警告蔣介石：假如他不肯表示讓步，美國就會停止以後任何的援助。同時還得答應，如果他們同意解決他們的問題而不用訴諸武力，美國就會幫助他們建立一個聯合的綱領，使中國在世界上成爲強國之一。這種意見看來似乎就成爲今天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的基礎。然而這裏還有個困難，雖然一些委婉的說話也許會遮住了事實，美國海軍陸戰隊目前在中國的真正的作用，其實就是要支持國民政府的軍事目的。他們的任務本來是要解除日本軍隊的武裝，可是這個計劃事實上是停止了。日本軍隊祇有已經從朝鮮撤退了，但很少從中國撤退的。船隻缺乏不是這問題的真正答案。其實，這完全就爲了蔣介石不肯讓他們走。

日本在華還有很大的兵力

蔣介石是用了日本的技術人材在華北從事工業，他是用了千千萬萬日本的武裝部隊去執行他那不宣而戰的內戰，要利用日本兵做成他自己及在陝西省內強力的中國共產黨軍隊之間

的緩衝區。他害怕倘若日本兵撤退了，中共的軍隊就會一直向海岸發展，切斷了他與東三省的交通，把他留在那邊的軍隊孤立起來，或者連整個華北也被中共席捲而去，那就是何以日本本國雖然已被佔領，而在中國的日本軍隊還保持着龐大的兵力的原故。而這些兵力恰恰就是杜魯門總統所要消滅的。（德臣西報）

赫爾利的下場

斯特魯瓦特

尋常，當一個公務員不能完成他的任務的時候，他便悄悄辭職，而他的缺點也就被人們仁慈地忘掉。這在外交界是實在的情形，在外交界裏照例是不喜歡叫人意氣用事的。但赫爾利却不是一個能够欣然承認失敗的人。這在他任駐華大使的短短然而多事的期間，是屢次表現了出來，而當他最後不可避免地干涉中國內政的事實越來越明顯，至遭國會底指摘的時候，他底過度的空想已不容許他和平地下場。他發表了憤怒的公開聲明，這聲明祇表現了他自己的無能，負不起國務院所交給他的責任。

他企圖把人們對他底失敗的埋怨轉移到他以前的屬員底身上，這更是他底空想和不勝任的反映。固然，他的駐華大使館館員（幾乎就是他一個人）反對他不斷支持重慶政府裏面的反動份子，但我們不要忘記：在每一件事情裏面，赫爾利政策都在作祟，而在過去六個月或八個月當中，他身邊的人物都是他自己所選擇的。國務院的中國課對於他也沒有加以約束。當衝突發生的時候，赫爾利便極力反對那些曾經多年研究中國複雜政治問題的專家們底意見。赫爾利也許會認定即使美國不答應支持國民黨，內戰也要爆發，但他是沒有理由埋怨美國捲入爲對抗那些反對我們參與中國內部紛爭的人們底鬥爭的。赫爾利指摘某些職業外交家公開同情中國共產黨，這是一種熟思的誣衊，這誣捏顯然是有政治目的的。熟悉中國問題的專家們所主張的政策從開始就是以史迪威和高思的政策爲基礎的。他們力圖避免把美國供給中國抗日的軍火被用來進行內戰，並力圖援助一切集團——不祇中國共產黨——設法在中國建立一個較民主的政治機構。相反，赫爾利對國民黨的無條件的支持，祇有鼓勵重慶抗拒人民大

衆的要求民主憲政的改革。

在赫爾利的聲明裏面，最清楚地顯出他不稱職的一部份，就是他那自相矛盾的指摘，說這些外交官同時在贊助『帝國主義集團』和『共產帝國主義』以反對『民主和自由事業』。要在一篇短文裏來分析那些顯然存在赫爾利頭腦中的關於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的混亂，是不可能的。把『民主』和『自由事業』等量齊觀，是分析這種混亂的公平方法，但甚至那也不能解釋他所責備職業外交家們對中共的同情怎樣使我們『被某勢力集團所吸收』以反對『共產帝國主義』然而，也就是這一特殊的指摘會證明他的話沒有錯，即他們的政策（和他自己的政策相形之下）已奠下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基礎。

赫爾利的聲明雖然是雜亂無章和沒有根據，但却被反英和反蘇的報紙所利用。不過這聲明在終局的影響畢竟是有利的。美國人民不但有權知道我們捲入中國內部問題的底細，而且有權知道我們對外國的重要問題所採取的政策是怎樣決定的。他們將特別感到興趣要知道爲甚麼一個生手的外交家的意見竟可以阻止國務院錄用那些曾經研究中國問題多年的人物。另一個有關的問題就是：赫爾利既然不勝任，爲什麼仍可以留任那麼久？一般人都曉得，在幾個月前，甚至在赫爾利回國以前，國務院曾選出了一個繼任人——一個在中國有長久歷史的人物，但在蔣介石寫了一封緊急的信要求美國保留赫爾利之後，國務院又宣布他將回到中國去。社會人士無疑是想知道：爲什麼一個中國官員的見解竟可以左右美國人民的旨趣。國會如果能進行調查這些問題，那會是很有用的。

在赫爾利的辭職掀起軒然大波之後，總統顯然是不可能再依照原來的計劃，委派一個職業外交家來代替他了，他不能不找一個在美國能孚衆望同時在中國能最受敬仰的人物。要選擇一個對中國沒有認識的軍人（特別是在政治問題最嚴重的時期）是很成問題的，但馬歇爾

將軍却不是一個普通的人物，而且對中國並不是全無認識。他的能力是稀有的，同時我們更沒有理由相信他會抱着赫爾利那樣的反蘇偏見。他的任務雖不可羨慕，但他將獲得任何外交家所期望的支持而負起他的任務。

杜魯門總統已答應在他到重慶之前給他以特別的書面的訓令。這些訓令大概將和一年以前給予赫爾利的在原則上沒有多大不同，祇留出若干餘地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無疑地，國務院方面將要求這位新大使努力尋求解決國共兩黨紛爭的途徑，並協助形成一個關於美國以軍事和物資援助中國的長期政策。總統是否將有其他聲明，不得而知。但如果總統能利用這時機來重申他在海軍節所發表的演說中所提到的美國對外政策的原則（因為這些原則是適用於中國的），馬歇爾的任務就會顯得極明朗了。這樣的一個聲明對於中國內部局勢將有重大影響。如果我們把政策明朗地申明，那這大胆地在進行準備內戰，以為美國會供給軍火，會付帳的軍閥們是會失掉他們的勝牌的，因為沒有一個負責任的美國官員敢保證給國民黨軍閥所需要的援助，如果這些軍閥們想在全中國建立他們的統治權的話。倘若總統能夠聲明：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援助，須視中國政府對基本民主原則的接受程度而定，那末，重慶就會被迫放棄它對憲政改革的反對，因而就可能開闢解決中國內部的困難道路。

我的和平觀

馬歇爾

本年度時事講座所討論的已是舉世人士心目中的問題，我相信諸位和收音聽衆們都同樣地感覺到我們對艱苦獲得的勝利有重大的責任。今日美國人民已遠較往昔敏銳，他們已經覺得他們爲國家而至於世界命運所負責任空前重大。

人類的社會是這麼錯綜複雜，甚至那些對它有深切認識的人都難免失敗。我們中是否有人對今日我們心目中令我們惶然不安的問題作一個完滿的答覆呢。我確實無法提供那種令人滿意的答覆。到美好的世界去是沒有捷徑可循的。然而我却相信如果我們有了一致的信念和堅毅果敢的精神，我們就不難得到較好的路線和方針。

在現階段，世界於連受空前慘重的戰爭損失之餘，人類道德上進展的跡象顯已極少。問題的討論可悲觀也可樂觀；然而和人類在七千年有史以來道德上和社會上是否有進步跡象一事無關，我相信有史以來人類都不斷地爲建立自然和人類關係中的秩序而努力則是無可厚非的事實。

這個世代沿襲下來的傾向已被稱爲『法律感』。世界上有個相沿下來的法則，那就是否定『法律感』就是否定天。我們承認科學的進步，人類在科學的領域裏了解並累積下自然知識，漸漸地了解它運用它。我相信世界自有政治始就有了秩序感。起先人們創立了規繩行動的法則，無論何時何地這種法則都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東西，這種法則首先始於以家庭爲基礎繼而至於以民族爲基礎的社會，旋即發展至國家。

亟需環球性法律

在國家中，人們爲生存而定下某種法則，幾乎在世界上任一角落裏，謀殺，搶掠，偷竊都是違法的。在我們的錯綜複雜的社會中，以強權攫取他人利益是不法的。

不僅這些事是不法的，而且世界各地且定下刑罰作爲法律的後盾。在紐約，警備隊，警察，監獄而至於電椅激勵我們的一舉一動墨守人爲法律。我想信幾世紀來人們都致力於擴展這些傳統法則至全世界。關於這，人們有兩種方法：我們可以說其一是合作，另一是不合作或獨裁獨霸。無論希特勒懂不懂這點，他在這次戰爭中企圖建立一種世界秩序，以他的方法來說，就是霸治世界。在另一方面，國聯則設法用合作方法建立環球性秩序。本世紀前有很多這兩種不同方法的例子，我所舉出上述兩個祇是爲了它易於認識。這兩種方法或此或彼總有一個成功。我相信時間告訴我們應即建立某種環球性法律。社會和國家法律已不够用了。我們自身已不能適應實際需求。

根本說來我認爲問題在於：那一種方法將獲得優勝——合作的抑或獨霸的環球性秩序？爲了美國是世界上強大的一員，我們對決定環球性法律的訂立密切關心，這也就是我所認爲勝利後的責任。

我很明白，決定合作和獨霸兩者間勝利誰屬的因素在於誰爲共中之強，合作者抑或獨裁者？這好像已是自然的定律。按理說，合作者通常就是那些一國內政由人民自行決定的國家。簡單說，民主國家。民主國確是以合作方式組織的國家。專權者和獨霸者是專制的。在民主國中，美國顯然是最強大的一員。因此今日合作者的力量維繫於美國的力量。

我們和我們的盟國現已展開建立聯合國機構的工作，喚起合作建立環球性秩序的意識。

贊同這種信條和加入這種組織的國家不該也用征服世界的希特勒的方法建立世界的秩序的意見，同時並不應有各自顧全自身利益的觀念。他們願望在於設立環球性的反侵略或反國際混亂的法律。它的自身就時常發生混亂，是以它們應致力加強這種法律的建立。

如果聯合國的組織是强有力的，那末我們就得歸功各參與國的努力，那些反對它的人絕非它臻於健全的原因。在我個人說來，我相信除非聯合國組織在美國力量的支持和援助下，該組織甚至極渺茫的成功機會也沒有。顯然地，如果沒有我們的强有力的支持，聯合國的營養就未免太貧乏了。

今日我們還很強大，然而除非我們採取積極的步驟，使前此我們以生命金錢等犧牲換來的和平恆久存在。今日我們的強大也將跟着歲月的消逝在不久的將來成爲明日黃花了。

現在我們正努力於最迅速的可能期間完成復員工作，我認爲這是很對的。作戰機構吸取國家資源已好幾年。平時生產和生活方式的恢復愈迅速，國家經濟穩定和消弭世界混亂的工作也就愈易完成。

雖然，除非某些永久平時計劃已確立或早日確立，事實上我們的軍事設備在今日的復員數率下已難期能保障國家的安全。

在此時此刻美國輿情高漲沸騰聲中，事實上復員不僅已成爲軍事實力分裂的事，而且顯然已成爲否認我們對世界的職責的事。如果我們要培養起孕育長成中的聯合國組織並爲下代開創秩序的前路，我們就得即速採取某些步驟以決定我們的戰後軍事政策的要點。這是我平生最確信的一件事。

人們曾討論我們作戰動機和目標是些什麼。我們爲什麼作戰？我們爲防止德日自行其是而戰。那確是我們目的之一，然而那祇是我們的龐大血肉和金錢賭注的次要目的，我們還有

另一只主要目標嗎？我覺得我們有，我們已獲得世界人民的信念，使建立一合於正義與傳統的 world order 成爲可能。信念確是一個不可捉摸的東西，可是惟其如是它和我們一切可捉摸的事有莫大關係。在一九三八年，我們還沒有打破人們對於德義日軍力的信念，今日世界都已認識了我們的力量。我甚至應該說我們都相信我們的海陸空軍都是不可制服的。德日會爲我們的作戰意志，作戰力量和絕對優勢而震驚，而倉皇失措。但過去懷疑我們的力量又何必德日兩國。

信念在消逝中

最後勝利到臨的一天，一切這種懷疑都煙消雲散。可是諸位還要記取，那個信念是和一切不可捉摸的東西般時刻在消逝中，除非我們致力於保持它，它就會離我們而去。

正像幾個月前世界已完全認識美國的勇氣和力量一般，今日他們已目擊着我們正返回平時的老模樣。我們目擊着我們展開復員善後工作的熱忱，然而迄今他們還找不到我們有永久保持既得的勝利花果的顯著跡象。難道我們今日就真的容許和戰前同樣的猜疑形勢到來麼？今日我們就拋去萬千美國人民血肉換來的勝利花果嗎？我們真的就卸去勝利的責任嗎？

浪費一國從勝利中得到的政治利益在美國不乏前例。一國偏重內政設施是件易於理解的事，因爲完成這個世界上的大事原就沒有簡易的方法。勝利並非輕易獲得。實行勝利的責任，實現我們此刻輕易地談到的未來也就需要很大的努力和犧牲。

我們應該明白克盡我們的職責並非那些空洞的言詞可比。它需要積極的努力和犧牲，尤其重要者它是順序漸進不可或輟的工作。我們不能一下子就完成這種工作。即使美國今日採取了健全的外交政策，如果我們不能經常不斷地擁護它，這種政策也是徒然無用。

舉一個例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會會通過一九二〇年的國防法案。它並非我們所能擬具的最好的計劃。然而大體說來它是健全的，如果它廢續存在結果一定很不錯，然而它並不這樣。

國防法案上總統的簽字墨跡未乾，由於撥款案的作祟該法案的力量就被大大削弱了，撥款案使美軍實力自二十九萬七千名減至十六萬名。翌年，撥款又減少百分之二十五，較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陸軍部所提出的撥款案只及四分之一強。是以國會就完全否定了維持軍備的決策，它並不直截爽快地反對議案，它却用拒絕撥付足量款項的辦法來否定這個國防法案。國內外軍事實力就減至大大不夠的十三萬名的地步。

當時人們曾說國家的經濟不能負擔那個軍費的重荷，現在人們也將這麼說。如果你認為國家的經濟能擔負起戰爭失敗而不能負擔起國防費用或甚至倒能負擔起戰勝後的三百億以上的戰債重荷，那不是笑話嗎？

直到一九四〇年春當希特勒統治歐陸的野心將近實現時，我們的海陸建軍費實際上才達十七億五千萬元左右。國會確曾在法國淪陷後增撥巨款，然而動員的巨輪剛剛開始轉動，於那一年中實現全部建軍計劃已成爲不可能的事了。

在法國淪陷那一年，美國娛樂運動場所的收入統計約在十五億元左右，幾乎和我們的全部海陸軍費支出相等。甚至在歷史上最緊急的那一刻我們在烟酒兩項費去五十五億元——約等於我們用於重要國防的三倍。請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對那種費用並無成見。那是我們生活自由的一部，就是我自己也要享受它。我的意思在於我們如果在歐洲文明崩潰聲中欣然地在這方面費去七十億元，我們至少也應及時負擔和平和國家安全以及我們自由所亟需的費用。

「安全和」香烟費」

在一九三七年世界漸漸變如火藥庫的時候，我們僅動用國家歲收百分之一點六於海陸建軍，在暴風雨即將到臨的那一年，美國動用五十億元或歲入百分之七於應付那個我曾指陳過的迫在眉睫的危機。

我衷心相信如果我們相當注意國防，軸心國也就不致發動戰爭。如果我們擁有強大的實力，不像當時那樣薄弱，那末這次在戰爭中死難的萬千亞歐美人民今日當還活着。敵人認為我們將不計生命和自由的犧牲而正視現實。然而我們並不這樣，結果我們就祇好以百萬傷亡和天文數字金錢的代價來挽救我們的安全和國際地位。我們的盟國不給了我們充裕時間麼，然而我們努力的結果雖然那麼大，可是太遲了。

陸軍部曾提出好幾個議案，要求國會於財政力量許可範圍維持我們未來的實力。這些議案經常遭受到那些自認為有較好辦法的人們反對。我平生最反對武斷主義者，並認為它是軍人的致命的精神病，然而今晚我在這兒却要以最大的決心說，除了維持軍力外我們沒有別的保障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的辦法。我相信美國人民對他們的決定命運的問題將加以好好的考慮。

毀滅與原子彈俱來

最近我們都陷入興奮的氣氛中，我們從種種新發見中得到慰藉而放棄了積極的行動，如果這種科學上顯著成就的意義僅僅在於使我們的行動一變為不行動，那末它們對美國的命運將有很悲慘的影響。我考慮新武器在軍事上的作用已有二年之久。我以為對這個問題較任何

美國人都關注，我考慮到原子彈和軍事而至於文明的關係。

每次我都得到同樣的一個結論，那就是原子彈可能使我們維持軍力並運用這種力量，因而使融洽的社會秩序成爲更迫切的事。

任何人都不能預料未來，然而超音波原子火箭在任何或有的未來戰爭中將有莫大影響已不難想像。可是這並非說它將使我們人力物力的準備減少，我們甯可說這種可怕的新武器將使人力物力的需要大大激增。

最近冷漠的輿論認爲我們現在無需顧慮到未來的軍事問題。三年前我就在紐約，美軍登陸北非廿四小時後我參加某政治科學專科學校會議，那時我以下面幾句話作結，這些話如在此時刻說起來好像更適切：

「此刻我對政治科學的特別興趣在於經這一次戰爭後像我們這個時刻追隨着科學的民主國家，將因戰爭而大大進步。這是有歷史意義的事實。那是戰後人民迅即復員和殷切要求交卸其戰債負擔和休息的結果。」

「我們已加入一個可怕的戰爭，我們的一切利益都要貢獻與戰爭而期於最短期間獲得勝利。可是我鑒於你們對政治科學及其與軍事密切關係有濃厚的興趣，我現在請你們審慎地考慮一下這個你們所研究的和軍事有關的戰後政治應怎樣重整。這個論題的理論將成爲事實。我們定要考慮一下太平洋和大西洋濱海各國人民的不同關係。我對軍事特別不感興趣，我常常談到它，繼它而來的每每是戰爭，然而我們也要研究它。對於在這種種反動的力量中，我們怎樣才能免蹈三十年來的悲慘覆轍並令現在的計劃重新崛起呢？我們要真切地認識世界各國和人類的感情及成見，並尋覓出確保美國自由和世界和平的方法。」

那是在三年前所說的話，當時我軍正湧登卡港灘頭和阿爾及爾。我認爲那一段話正是

代表現在今日美國人民的心理。

現在或們還有人再聽信那些黷武主義的論調只注意少數反對者的呼聲，自私動機的提議，而覓求一個簡單的方法嗎？我們還要浪費我們的勝利而讓我們的子孫遭受更長期的恐怖和破壞痛苦嗎？

我請求你們自己把這個論題所說的一切和我們的歷史審慎地研究一下。我請求你們討論一切矛盾意見，認清黑白。然後請繼之以行動，而且不要太晚，要及時行動。

美國務卿貝爾納斯

致加洲共和黨衆議員安德遜的信

我們贊成建立一個強盛、團結和民主的中國。這一個國家將有助於遠東的和平及穩定，並將使中國能有效地支持聯合國機構；雖然我們認爲這一任務是中國必須大部以它自己的努力來完成的事情，但我們竭力以一切適當的和可以辦到的辦法來奉行最能便利中國達到「內部」團結與穩定的政策與行動。

我們認爲中國、美國、英國及蘇聯間之合作對維持遠東和平與安全非常重要，而且這些國家以及其他愛好和平國家間的這類合作，應在機會均等、尊重國家主權的基礎上，擴大其經濟和其他努力的一切正當方面。

在戰爭年代中，我們的政策是幫助我們中國盟邦至可能的最大限度，以共同實行對日戰爭。這種幫助採取貸款允許供給軍用及非軍用租借供應品，訓練和裝備數量有限的中國軍隊，在中國利用我國空軍及其他有關活動的方式。自日本投降以來，我們即在幫助我們中國盟邦實行現在留在中國的極龐大的日本武裝部隊的投降解除武裝及遣送回國。

美國務卿貝爾納斯

答覆赫爾利的控訴

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一直就是同情和支持蔣介石政府。

美國在戰時對華的直接目的是促進若干政治集團的軍事團結，以便促成對付共同敵人日本的聯合力量。我們遠大的目的則是使中國發展成爲一個強固團結與民主的中國。當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爲了達到這一遠大的目標起見，中國中央政府和各黨派必須以真誠願意妥協的態度解決其爭端。我們始終相信蔣委員長領導下的政府是發展民主中國最滿意的基礎，但我們也相信中國政府必須擴大範圍容納各黨各派的代表。這絕不是一個輕易的問題，要這一問題能夠獲得解決，必需機智、審慎、忍耐、和冷靜，光是一些口號是無能爲力的。

這一問題的解決，首先就需要依靠中國各領袖自己的誠意。此外，我們的勢力是一個因素，我們將盡其所能運用我們的勢力以鼓勵中央政府以及所謂共產黨及其他黨派互相讓步，達成問題的解決。

赫爾利大使過去對我，以及以後對報界和本委員會的所說的一切，如果我的了解不錯的話，他對我們的政策沒有不同意的地方。再者他曾經對我及本委員會表明，在他努力執行這一政策的時候，曾不斷地從兩任總統和三任國務卿那裏獲得支持。但他反對這種政策未予公開的缺點。

現在對於前任國務卿所發表的所有的演講、新聞及信件，我並不是每一棒都很熟悉，同

樣，對於近幾年來國務院官員在中國及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件，我並不是每一樁都已弄清楚；我沒有機會來研究各種記錄，而且最近的將來也不可能。

然而，我認爲我們對華政策的綱要從未隱蔽也並不難於理解。在我們的對華政策中，赫爾利大使最爲重視的是支持蔣介石國民政府。在我們對遠東政策的各方面，這一點似乎是最爲清楚而明白，我們正式承認的是國民政府，我們的大使是派駐國民政府的大使，我們的戰時供應品和財政幫助，一致是祇交付給國民政府。在開羅會議席上，代表中國出席的是蔣介石委員長，在舊金山會議席上出席的是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他並簽訂了聯合國憲章。坐在外長會議席上的也是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

近幾週來，美國軍隊的駐在中國，已成了美國人民最關心的事情，各新聞記者常常對我提出這事的問題。我已明白聲言，我在華軍隊的唯一任務，是爲了便利國民政府的軍隊依照盟軍最高統帥的命令接受日軍投降。凡此種種都是我們承認蔣委員長政府爲中國合法政府的明證，而赫爾利大使還說我們的對華政策缺乏明白的表示，殊屬令人不解。

我從未接到過赫爾利大使要求公開政策的書面請求，在談話中也從來沒有提到，而且，從他九月間回國以來，曾經和總統有數次會談，每次我都在場，也並沒有聽到赫爾利大使提到這件事情。自大使在這裏出席作證以後，我曾要總統想一想是不是赫爾利大使曾以書面或口頭請求公開發表我們的對華政策，總統答覆說，並沒有過這樣的請求。

我最近寫給加州議員安德遜的那一封信，也就是赫爾利大使曾經加以引用的，是一封對國外人士的復信。當國會議員有人要求對於我們的外交政策有所解釋時，我以爲是應當答覆的。但如果沒有這種詢問發生時，我就認爲要表白我們的政策，祇有在一定的情況下才有必要。當然我並無意逐一解釋近年來我們對華及全部外交政策中的每一項事件。

我認爲爲求不負忠誠機警而又能忍苦耐勞的外交工作人員，並不負國務院中一般人士起見，我不得不對赫爾利大使所作的責難，略加指責。

外交工作人員是非政治性的政府雇員，由考試競爭中選拔而來。他們爲了國家權益而長期工作，熱忱而絕難成爲衆所週知的人物。根據我個人的經驗，他們的自尊心與忠誠，實在使我甚爲讚譽。

我和艾其森謝偉思等人並不認識，但由於赫爾利大使的特別責備，我已把艾其森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所打的電報以及謝偉思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所作的備忘錄找來讀過。

上述兩項文件就是赫爾利大使猛烈援引而認爲是證他兩外交官員企圖妨害他完成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判斷艾其森的電報，必須根據當時以前的中國局勢的背景而加以認識。赫爾利大使和前大使高思一樣，他們都會不僅努力尋求中央政府與所謂共產黨間的團結，並且力謀中央政府與其他小黨派間的團結。

當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赫爾利大使離渝返回華盛頓的時候，我更加了解到中央政府和共產黨的談判已瀕於中斷的境地。

而當赫爾利大使離開重慶大使館的時候，艾其森以參贊地位，自然地接管了大使館的事務。

根據國務院的記錄艾其森在二月二十八日，即赫爾利大使離渝後九天而距離抵達華盛頓尙有三天時，發出了他的電報。該電內容包括他個人根據當時變遷中之情勢廣泛而透徹之報告，並以下列之建議結束道：這許多變遷着的局勢要求我們重新調整我們當前的策畧艾其森在他的電文中，明白的陳述，當魏德邁將軍與赫爾利大使同時在華府的時候似乎應該是討論這個問題的一個適當的時候。

美國派駐外國的官員應負責提供有關局勢新聞之完全而正確的報告，這係於確定和執行美國外交政策都是必要的。他並且應該進一步時時提供有關政策的建議。如果他所提供的建議能够被採用，那麼他的建議無疑必至能够明白的反映他的自由而忠實的判斷。以大使來說，這種意見是一直被認為當然的。而一個普通官員在大使離職期間担任代辦的情形也同樣的被認為當然的。舉例來說，自從九月以來，我們曾經依靠過駐華大使館高級官員的報告。我們很難理解艾其森究竟是怎樣沒有遵照這些規例與傳統的詞句和精神。他二月二十八日的電報便是他個人對於當時中國情況的一個完全而自由的報告。他的建議就是一種熱誠的努力來幫助國務院確立未來的對華政策。其中沒有任何一點指示出他在製造建議中有觸犯上級之意。

赫爾利大使向我提及的關於謝偉思的特殊行動，就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十日所提出之備忘錄。我也曾經仔細的讀過這個備忘錄。在我未談及其內容之前，我希望提起大家對於幾個事實的注意，因為這幾個事實曾經被提到我的面前來。當謝偉思先生提出這個備忘錄時，雖然他保留了普通外交官身份，但他並沒有隸屬重慶美國使館之下，他是史迪威將軍的部下派往延安的政治觀察員。他那時在行政上是對史迪威而非對美國大使館。

赫爾利大使，那時候是以大使的等級担任總統在華的私人代表，但是他並非美國駐華大使。他沒有負責主管美國在重慶的大使館。在這種情形之下，實在不能以謝偉思所寫的文件有違抗赫爾利大使之舉。

至於備忘錄本身，包括若干關於根本變更美國對中國中央政府政策的建議。這個建議措詞強勁，而結論則多少有些激烈。

這備忘錄是寫給史迪威將軍的，同時送了一份給大使館。大使館把它轉告國務院，同意

結論的卻附加了一個模稜兩可的備忘錄，認爲這代表着一個政治視察員的意見。

當備忘錄送達國務院時，即發交中國事務司，在該文沒有再轉呈上去時，中國司附加了另外一個備忘錄，並以堅決的態度說明，該文內容雖屬可資參考，但其結論中的許多地方（特別舉了出來）則認爲是錯誤的。

我的目的並非詳論這兩個文件。根據我所有的情報，我認爲其中並無足以證明艾其森或謝偉思有絲毫不忠於上級長官之嫌，所有在不過爲彼等經過適當的方式，向上級人員發表他們對政府所實行的政策有或大或小的不同意見而已。誠然，遵從並施行政府的政策是每個美國官員的天職。但事情在變化着，而政府中的事情時常變化很快。每當一個官員確實認爲在變化了的情形下有所需要的時候，他應該毫不遲疑的向他的上級長官提出他的意見。

赫爾利大使的另外一個責難便是有某一個官員或職員不僅發表其對上級長官不同的意見，而且通知與共產黨部隊有關的某人，謂大使並非代表美國政策。對於這種行爲，動如果是真的話，確實沒有原諒的餘地。我要第一個譴責這種行爲並且開除犯罪的人。但是赫爾利大使並未向我，也沒有向這個委員會，提出明白的證據，證明任何職員有犯這種行爲的。爲政府忠實服務的人不能僅憑個人的懷疑而隨便開除，其名譽也不能無故被毀。我將會極端的不愉快，如果國務院內有任何官員，在外交工作之中或外交工作之外，因害怕冒犯我或國務院中的任何其他人士而不敢用由正當的方式提出真誠的報告。如果那一天到來的話，我必將失掉了順利進行我所担任的重大責任而必要的幫助與指導。

杜魯門總統

美國對華政策聲明

美國政府認爲世界的和平和繁榮，在當前新的未開發的時代中，有賴於主權完整的國家在聯合國組織中合力謀求集體安全。

美政府堅信，一個強盛，團結和民主的中國，對於這個聯合國組織的成功，對於世界和平，都是極端重要的。中國如由於過去日本所作那樣的外來侵略，或由於暴力的內爭，因而處於無組織及分裂的狀態，那麼，不論目前或將來，都對於世界安定及和平有破壞作用。美國政府久已確守着一個原則，即內部事務的處理，是各個主權完整國家的人民的責任。但本世紀的許多事件表明，世界任何地方的和平被破壞，就威脅整個世界的和平。因此，美國及一切聯合國國家的最緊要的利益，是在於中國人民不應該忽視以和平談判的方式，消弭其內部分歧的機會。

美國政府認爲必需的是：

一、中國國民政府的軍隊和中國共產黨人及其他持有異議的中國軍隊，應設法停止敵對行爲，以使全中國完全復歸於有效的中國治權之下，其中包括日本軍隊的立即撤退。

二、應設法成立一個各主要政治份子的代表所組成的全國會議，以設法早日解決目前的內爭——這個解決將使中國統一。

美國和其他聯合國國家，一向承認目前的國民政府爲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它是達到中國

統一的目標的正當工具。

美國和聯合王國由於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由於其參與的今年七月波茨坦宣言以及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中蘇條約及協定，都對中國的解放，包括滿洲歸回中國治理在內，負有義務。這些協定都是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締訂的。

爲了繼續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進行戰爭方面的經常和密切的合作，爲了配合波茨坦宣言，以及去除日本在中國殘留勢力的可能性，美國在日軍的繳械及撤退方面，負有確定的義務。所以，美國曾援助，並將繼續援助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有效地在解放了的區域內解除日軍的武裝，撤出日軍。美國海軍陸戰隊現在在華北，就爲了這個目的。

美國過去承認，並將繼續承認中國國民政府，並且在國際事務上，特別是在從中國清除日本勢力方面，和國民政府合作。

美國深信，要有效地達到此目的，迅速作停止敵對衝突的談判，是必要的。美國的支助，將不致發展成爲影響中國內爭中任何一方面的方針的軍事干涉。

美國已經被迫付出巨大的代價，以恢復最初由日本侵略滿洲所破壞的和平。除非日本在中國的勢力完全去除，除非中國能獲得統一，民主及和平的國家的地位，則太平洋和平的維持即或不落空，也會受到危險的。這是美國陸海軍部隊暫時留在中國的理由所在。

美國知道目前的中國國民政府是一個一黨政府，並認爲如果這政府擴大包容國內的其他政治份子，就能够促進中國的和平，團結和民主改革。因此，美國竭力主張該國內各主要政治份子的代表所舉行的全國會議能商妥一些辦法，這些辦法要使這些政治份子能公平而有效地參加中國國民政府。人們認識，這就需要修改一黨訓政制，那制度是中國國父孫逸仙博士作爲國家走向民主的過程中的臨時措施而建立的。

自主的軍隊如共產黨軍隊的存在，和中國的政治團結不相容，並且使它成爲不可能。廣泛的代議制政府成立之際，在中國一切武裝部隊有效地併入中國國民軍的時候，自主的軍隊將歸消滅。

符合於其經常表示的有關於決權的見解，美國政府認爲達到中國政治團結所必需的詳細步驟，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制定出來，任何外國政府干涉這些事情，是不妥當的。雖然，美國政府感到，中國在其領土內消滅武裝衝突，並使其領土成爲世界安定及和平的一部份，這是中國的明顯責任——這責任由國民政府和中國一切政治及軍事團體分担着。

在中國經上述路線走向和平和團結之際，美國準備以各種方法援助國民政府辦理國家的善後，改善農業和工業經濟，並建立一個能够克盡中國對維持和平及秩序的國內和國際責任的軍事組織。爲了進行這些援助，美國將準備對中國的信用貸款和合理條件下借款的請求，作有利的考慮，以進行一些計劃，這些計劃將有助於全中國健全的經濟發展，以及中美貿易的健全關係。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